

国际私法

主编 金彭年

21世纪实用法学系列教材



总主编 王建东



国际私法是以国际民商事关系（从一个国家角度看是涉外民商事关系）为其调整对象的，然而，它首先要解决的是由于各国法律规定不同产生抵触而出现的法律冲突问题。国际私法调整的对象是国际民商事关系，简言之，这种关系是指含有跨国因素或涉外因素的民商事关系。国际私法不仅在调整对象上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而且在调整方法上也有独特之处。间接的调整方法是指用冲突规范或冲突法进行调整的方法，即在解决国际民商事关系中的法律冲突问题时，在有关的国内法或国际条约中设置冲突规范来确定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来调整该民商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而直接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通过冲突规范的间接调整方法，必须经过两个步骤才能确定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第一步适用冲突规范，找到某个国际民商事关系应以何国法来作为准据法；第二步才是适用该准据法来确定该国际民商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间接调整方法有以下特点：第一，独特性。间接调整方法是国际私法重要的独特的调整方法……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1世纪实用法学系列教材

国际私法

主编 金彭年

副主编 汪江连

撰稿人 (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

汪江连 许 颖 吴德昌

吴红列 严 飞 汪迪波

金彭年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私法 / 金彭年主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21世纪实用法学系列教材 / 王建东主编)

ISBN 978-7-308-05774-5

I . 国... II . 金... III . 国际私法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 D9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9574 号

国际私法
金彭年 主 编

丛书策划 石国华

责任编辑 石国华

封面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排 版 星云光电图文制作工作室

印 刷 富阳市育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32

字 数 574 千字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5774-5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072522

《21世纪实用法学系列教材》

主编名单

法理学	王建东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陈林林	浙江财经学院副教授、博士后
宪法学	焦宏昌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法制史	王申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民法	罗思荣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刑法	陆敏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商法	高晋康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知识产权法	李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余永祥	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罗文燕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民事诉讼法	潘剑锋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刑事诉讼法	张建伟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
经济法	李晓安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博士
国际公法	王虎华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经济法	张丽英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国际私法	金彭年	浙江大学教授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蒋月	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民法总论	罗思荣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毛亚敏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合同法	王建东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陈雪琴	浙江大学副教授
物权法	王全弟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侵权行为法	张新宝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婚姻家庭法	蒋月	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公司法	毛亚敏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本书主编简介

- 金彭年 男,1963年出生,浙江宁波人。现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教授,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在《法学研究》和《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10篇,著有《中国国际私法》、《国际民商事程序法》等书。多次荣获教育部、司法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科研成果二等奖。1995年和1999年两次获“全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由于对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1996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 汪江连 中国计量学院讲师(撰写第一、二章)
- 许 颖 中国计量学院讲师(撰写第三、六、十五章)
- 吴德昌 江西财经大学讲师(撰写第四、五章)
- 吴红列 浙江广播电视台副教授(撰写第七、十二章)
- 严 飞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讲师(撰写第八、十一章)
- 汪迪波 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撰写第九、十章)
- 金彭年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撰写第十三、十四章)

全书由主编和副主编最后统稿和定稿。许颖和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陈丹也参与了校稿工作。

出版说明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我国的高等法学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层次众多、形式多样的高等法学教育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为了适应不同层次法学教育的需要,我社编辑出版了这套以培养应用型法学人才为目标的《21世纪实用法学系列教材》。

一、针对培养应用型法学人才的需要,本系列教材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原理与应用的结合。强调以丰富多彩的法律实践来说明深奥的理论,以通俗易懂的基本原理来解答实践中的问题。为此,教材不仅重视对法学界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吸收,还特别注重对法律实务部门尤其是司法界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吸收。

二、根据应用型法学人才的就业状况,注重学历教育与国家司法考试的衔接。在满足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同时,结合国家司法考试的要求,对司法考试要求的知识点进行重点阐述,将理论通说与法律规定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紧密地联系起来。

三、为了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便于学员课后复习,对教材的体例作了较大的改革。每一章的内容由[导读案例]、[内容讲解]、[复习提要]、[课后练习]四个部分组成,结构完整,逻辑性强。

四、为了充分体现理论性与应用性紧密结合的特色,作者大多为既有丰富教学科研经验,又有较为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学者。本系列教材由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浙江东辰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著名建设工程与房地产法律专家王建东教授任总主编,策划拟定编写方案,其中,民商法系列由王建东和罗思荣(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共同担任总主编,负责相关稿件的审定。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厦门大学、西南财经政法大学、首都经贸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财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教学科研单位的知名学者分别担任各册主编,负责各册教材的编写。

五、对为本系列教材的编写出版而给予大力支持的各个教学科研单位,对为编写本系列教材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作者,本社致以衷心的感谢!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年9月

“道”“器”并重 学以致用^①

——《21世纪实用法学系列教材》序

王建东

步入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正进行着一场广泛而深入的改革。社会的转型,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呼唤着中国的高等教育从教育理念、教育目的、培养目标,到教学方法、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材建设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而所有这些改革都必须以高等教育的正确定位为前提。目前关于高等教育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是重学术理论还是重实际应用等问题的讨论,正是高等教育亟须解决的定位问题。

法学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的必要性不仅是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适应世界范围内全球性法学教育改革趋势的要求。法学教育的改革同样需要明确法学教育的定位,处理好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受苏联的影响,摈弃欧美大学的综合性模式,转而采用苏联的单科性教育模式,实行“对口教育”、“专才教育”。经过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除了少数几所大学保留了综合性大学的建制外,绝大多数大学成了单科性大学,同时还出现了一大批单科性学院^②,法学教育同样形成了以政法院校为主体的“专才教育”模式。经过“十年文革”,法学教育的命运与整个法制建设的命运一样,几乎被破坏殆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高等教育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办学的理念上由本科“专业教育”逐步向本科“通识教育”回归,在办学

^① 《周易·系辞上·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的关系,可解读为体与用、本质与现象、精神与物质、理念与工具、理论与应用的关系,本文主要指理论与应用的关系。“学以致用”是孔子的重要教育思想,“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论语》中的许多论述都体现了孔子将“学以致用”作为学习的根本目的。

^② 蔡曙山:《论我国大学文科的发展阶段及办学理念》,载《学术界》,2004年第1期。

模式上由“单科性教育模式”向“综合性教育”模式发展。法学教育在处理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尤其在通识教育、素质教育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法学职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法学既是一门研究法律、法律现象以及规律的科学,又是形成法律职业技能的学问基础,是一门社会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法学的教育模式“应当是结合式的”,是“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两个方面的结合”^①。如果从“结合式”模式来考察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那么无论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有许多亟待改革和完善的地方。我国20世纪50年代开始采用的苏联“专业教育”模式,其实并不是我们现在所倡导的职业教育,甚至可以说是两回事。众所周知,我国的法律职业化改革刚刚起步,此前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职业,就不可能出现以培养法律职业人为目标的法律职业教育。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逐步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积极推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法律职业的形成创造了基本条件,而2002年确立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直接为我国法律职业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证。但是,总体而论,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并没有跟上法律职业化改革的步伐,以适应法律职业教育的需要。与一些法学教育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的法学教育本身不存在一个专门的职业教育环节,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职业职前培训组织和制度,而在四年制的本科教育中除了安排一些案例分析、模拟法庭、实习见习外,对与法律职业密切相关的职业伦理、职业技能、法律思维的教育和训练都相当薄弱,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还相当严重,与法律职业教育的要求还相去甚远。^②另一方面,从通识教育的角度看,我国的法学教育虽然一直以来比较重视以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为核心的“三基教育”,也提出了“重基础、宽口径”的要求,但并没有真正确立通识教育的理念,实现通识教育的基本要求。“通识教育以

^① 孙笑侠、夏立安:《法理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②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培养法律职业人为目标的法学教育中,一般都存在专门的法律职业教育环节。在美国,只有其他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才有资格就读法学院,其法学教育本身就属于职业教育,在三年的法律教育中广泛推广案例教育法和法律实际课,法学院毕业通过律师考试再有若干年工作经验的律师才有可能成为法官。在法国,通过考试后要经过国家司法学院两年的职业训练,才有可能担任法官、检察官。在日本,法律本科毕业并通过第二次司法考试的人,还必须完成两年司法研修所的实务教育。在我国香港的法学教育模式中,第一阶段为法律学士教育,第二阶段是以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为目的的法律深造教育,要从事律师、法官等法律职业的人必须完成第二阶段的教育。

尊重和满足人的本质需要、促进人的长远发展为出发点^①,显然法学教育的现状与这一理念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注重“三基教育”也不等于“重基础”,重部门法学轻理论法学的现象在学科建设、师资建设、课程设置等许多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所谓“宽口径”则需要在专业以内和专业以外两个方面来拓宽。在法学专业范围之内,我国目前法学本科教育课程主要由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及其他专业课组成,法学院的师资几乎均出自法学教育背景,法学与其他专业的交叉课程或跨学科课程甚少,专业内的“口径”并不宽泛。^② 在法学专业范围之外,由于通选课只是本科生主要课程以外的附加课,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③ 而且,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为宗旨的法律职业人需要比一般的专业人才具有更为广博的知识面,除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具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知识以及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而我们的法学教育尚无法满足这类教育的需要。因此,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法学教育的弊端在于缺乏实践性和开放性,增强法学教育的实践性和开放性乃是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④。换言之,法学教育中的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都有待在改革中加以完善。

二

法学教育定位的另一个问题是精英化和大众化问题。根据美国教育家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适龄青年的入学率在15%以下为精英教育、入学率在15%~50%为大众教育、入学率在50%以上普及教育),精英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三个发展阶段之一,高等教育大众化后,精英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模式仍然存在。据此,有学者提出,精英教育质的规定性指向有德行有才干的政治家和学术家;精英教育作为质的动态性解读,现代的精英教育是建立在高深学问基础上的一种以心智和人格为核心的高标准教育。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乃至普及化,本科教育的通才教育会越来越明显,而精英性会更加淡化;精英教育作为质

^① 蔡达峰:《我们的通识教育:关心人与社会的发展》,载《读书》,2006年第4期。

^② 美国的法学院通常由不同背景的教授所构成,法学也相应地多元化与多样化,跨学科的课程也越来越多,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参见周汉华:《法律教育的双重性与中国法律教育改革》,载《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4期。

^③ 甘阳先生据此提出应建立通识教育的“共同核心课程”,参见甘阳:《大学通识教育的两个中心环节》,载《读书》2006年第4期。

^④ 周汉华:《法律教育的双重性与中国法律教育改革》,载《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4期。

的层次性解读,精英是多层次性的概念,应有不同层次的教育机构来培养。^① 我们不妨按照这一观点,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及入学率和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质量及层次作为标准,来探讨法学教育的精英化与大众化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推进,特别是依法治国方略实施,法学教育也在改革和探索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提高,目前我国从事法学高等教育的院系已达 600 多个,在院校建设、专业建设、学科建设、师资建设、教材建设以及教学改革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为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培养了大批各种层次的法律人才,高等法学教育已经进入大众教育的时代。另一方面,如果从法学教育质的规定性来考察,法学教育应该作为精英教育更为妥当。法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维护正义的学问,这就决定了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无论是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等法律职业人,还是政治家、企业家、公务员以及一般的法务工作者,都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行、广泛的知识结构、较好的法学理论素养以及较强的专业技能,他们都应该是精英型人才。

当然,我们将法学教育从本质上定位为精英教育,强调法学人才应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并不是否定法学教育的层次性,事实上法学教育的层次性和多样性是必不可少的。随着法学教育的日益大众化,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也许会与其学历教育不一致,即不同层次的法律人才完全可能从事同样的职业或岗位,但不同学历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不可能相同的。为了适应培养不同层次法律人才的需要,法律教育机构同样应该有所分工,有学者提出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应分为三大类,一类为研究型的综合型的(主要是重点综合性大学),二类为应用型的专业型的(一般的高等学校,特别是地方高等学校),三类为职业型的技能型的。^② 目前第一类大学的法学教育中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主体,而其他学校的法学教育层次明显要低得多。而且,在法学本科教育层面也存在一本、二本、三本之分。因此,法学教育的目标应该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不同层次的法学精英人才。

三

有关法学教育的定位还有一个问题是注重学术性还是注重应用性。法学在一定意义上既是科学也是技术,是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总体上都要求理

^① 郭石明、盛颂恩、施建青、汤智:《高等教育:量与质的解读》,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7 年第 2 期。

^② 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的定位、特色和质量》,载《中国大学教学》,2005 年第 12 期。

论必须与实际相联系,理论素养的培育与实践能力的训练相结合。然而,不同层次法学教育在培养目标上的区别,决定了不同层次教育机构在学术性和应用性上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当年蔡元培先生把高等教育分为“大学”和“专门学校”,认为“治学”者为大学,“治术”者为“高等专门学校”,尽管这种分工未必适合于现代的高等教育,但作为一种基本的教育观念仍然适用于当今的高等教育。一般而言,研究型大学的法学教育更多地注重高深的法学理论,职业型院校更注重实用性教育,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一般高等学校,应特别强调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结合,既要重视理论素质的培养,又要重视实践能力的训练,也就是要着重培养通常所说的应用型和复合型的法学人才。

不同层次的教育机构为了达到各自的教育目标,就必须采用相应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而教材往往是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最基本的载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法学教材从法学教育恢复之初的几乎是苏联教材翻版的一些讲义,到司法部组织编写的统编教材、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法学教材,到目前种类繁多的法学教材,我国的法学教材建设取得了重大成绩,推动了法学教学内容的不断丰富、完善和提高。但是,我国现行法学教材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教材使用对象定位不够明确,就法学本科教育而言,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三类大学的法学教育,应该有与之相配套的法学教材,以满足培养不同类型法学人才的需要,但目前主流的法学教材,大多由研究型大学编写出版,适用于培养研究型人才。再如重理论轻实务,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也是现行法学教材的一大不足。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分析实践问题来阐述理论,运用基本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是法学教材应该很好解决的重要问题。

为了适应培养应用型法学人才的需要,本系列法学教材在内容的安排上突出了基础性、针对性和应用性,在法学理论的阐述上突出了通说和通俗性,在教材体例的设置上突出逻辑性和可接受性,力求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以上关于法学教育改革和法学教材建设的粗浅看法可能很不成熟,即使有一些有益的观点也因能力和编写时间的限制,未必能在教材中得到令人满意的体现,恳请法学界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是为序。

2007年8月于杭州六养斋

目 录

第一章 国际私法概述	(1)
第一节 国际私法的概念	(2)
一、国际私法的名称	(2)
二、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	(4)
三、国际私法定义	(9)
四、国际私法与国际私法学	(10)
第二节 国际私法的范围	(11)
一、国际私法的范围	(11)
二、国际私法的规范	(14)
第三节 国际私法的渊源	(16)
一、国内法渊源	(16)
二、国际法渊源	(19)
三、一般法理、国际私法原则和国际私法学说	(21)
第四节 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	(23)
一、主权原则	(23)
二、平等互利原则	(24)
三、国际协调与合作原则	(25)
四、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原则	(25)
五、最密切联系原则	(26)
第二章 国际私法立法与学说发展史	(32)
第一节 古代国际私法(19世纪中叶前)	(32)
一、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	(32)
二、法国的法则区别说	(36)
三、荷兰的国际礼让说	(37)

四、新法兰西学派与《法国民法典》	(38)
第二节 近代国际私法(19—20世纪)	(39)
一、美国学派和斯托里	(39)
二、德国学派和萨维尼	(40)
三、意大利学派和孟西尼	(44)
四、英国学派和戴西	(44)
第三节 当代国际私法(20世纪一)	(45)
一、英美国家	(45)
二、欧洲大陆国家	(49)
三、前苏东国家	(50)
四、亚非拉国家	(51)
第四节 各国国际私法立法史	(52)
一、14世纪以前的国际私法立法	(52)
二、14世纪至18世纪国际私法的雏形阶段	(52)
三、19世纪国际私法的发展阶段	(52)
四、20世纪各国国际私法的变革阶段	(53)
第五节 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史和学说史	(55)
一、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史	(55)
二、中国国际私法学说史	(59)
第三章 国际私法主体	(67)
第一节 自然人	(68)
一、自然人的国籍	(68)
二、自然人的住所	(70)
三、我国关于自然人国籍和住所的规定	(72)
四、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73)
第二节 法人	(77)
一、法人的国籍	(77)
二、法人的住所	(79)
三、我国关于法人的国籍、住所的规定	(80)
四、外国法人的认许	(80)
五、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81)

第三节 国家和国际组织	(82)
一、国 家	(82)
二、国际组织	(85)
第四节 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	(86)
一、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的概念	(86)
二、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的历史沿革	(87)
三、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的基本制度	(89)
 第四章 法律冲突、冲突规范和准据法	(96)
第一节 法律冲突	(97)
一、法律冲突的含义	(97)
二、法律冲突的产生原因	(98)
三、法律冲突的种类	(98)
四、法律冲突的解决办法	(99)
五、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	(101)
第二节 冲突规范	(104)
一、冲突规范的概念	(104)
二、冲突规范的性质	(105)
三、冲突规范的结构	(106)
四、冲突规范的类型	(106)
五、连接点(连接因素)	(111)
第三节 准据法	(116)
一、准据法的概念与特点	(116)
二、准据法表述公式	(117)
三、准据法的确定方法	(119)
四、发生时效冲突和区际冲突时准据法的确定	(124)
 第五章 适用冲突规范的制度	(132)
第一节 识 别	(134)
一、识别的概念	(134)
二、识别的产生	(134)
三、识别的依据	(136)

四、二级识别问题	(138)
五、“不诚实识别”问题	(138)
第二节 反致	(139)
一、反致、转致、间接反致、二重反致的概念	(140)
二、反致产生的原因	(141)
三、反致制度的起源	(142)
四、反致制度理论上的分歧	(142)
五、反致制度的立法与趋势	(144)
第三节 外国法的查明和解释	(147)
一、外国法的查明	(147)
二、外国法的错误适用	(150)
第四节 公共秩序保留	(150)
一、公共秩序保留概说	(150)
二、公共秩序的适用理论	(155)
三、运用公共秩序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159)
四、中国关于公共秩序的理论与实践	(163)
第五节 法律规避	(167)
一、法律规避的概念	(167)
二、法律规避的构成	(168)
三、法律规避的效力	(171)
四、法律规避的地位	(176)
五、法律规避的适用	(179)
第六章 法律行为和代理的法律适用	(185)
第一节 法律行为方式的法律适用	(185)
一、根据“场所支配行为”原则,适用行为地法	(186)
二、选择适用法律行为实质要件准据法和行为地法	(186)
三、采用多种连接因素来选择确定法律行为方式的准据法	(186)
四、中国关于法律行为方式法律适用的规定	(187)
第二节 代理的法律适用	(187)
一、涉外代理的法律适用	(187)
二、代理法律适用海牙公约	(190)

三、我国有关代理法律适用的规定	(192)
第七章 物权的法律适用	(194)
第一节 物之所在地法原则及其例外	(195)
一、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产生和发展	(195)
二、物之所在地的确定	(196)
三、物之所在地法的适用范围	(198)
四、物之所在地法适用的例外	(200)
五、我国法律关于涉外物权法律适用的立法与实践	(201)
第二节 国有化及其补偿法律适用	(203)
一、国有化的概念	(203)
二、国有化法令的域外效力问题	(203)
三、国有化的补偿问题	(203)
第三节 信托关系的法律适用	(204)
一、信托概述	(204)
二、信托的法律冲突及法律适用	(206)
三、《关于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的公约》	(209)
第八章 债权的法律适用	(214)
第一节 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	(217)
一、合同准据法的概念	(217)
二、合同准据法的历史发展	(219)
三、缔约能力	(230)
四、合同形式	(231)
五、合同成立与其他	(233)
六、中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	(235)
第二节 法定之债的法律适用	(238)
一、一般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238)
二、特别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244)
三、不当得利的法律适用	(255)
四、无因管理的法律适用	(257)

第九章 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	(261)
第一节 结婚的法律适用	(263)
一、结婚实质要件的法律冲突及法律适用	(263)
二、结婚形式要件的法律冲突及法律适用	(267)
三、几种特殊形式的婚姻	(267)
四、关于结婚法律适用的国际条约	(268)
五、我国处理涉外婚姻法律适用的立法与实践	(269)
第二节 夫妻关系的法律适用	(271)
一、夫妻人身关系的法律适用	(271)
二、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	(273)
三、关于夫妻关系法律适用的国际条约	(274)
四、我国有关夫妻关系冲突立法的状况	(276)
第三节 离婚的法律适用	(276)
一、离婚的管辖权	(276)
二、离婚的法律冲突及法律适用	(277)
三、我国处理涉外离婚的立法与实践	(278)
第四节 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适用	(281)
一、婚生子女	(281)
二、非婚生子女的准正	(282)
三、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适用	(284)
四、我国关于亲子关系的法律规定	(285)
第五节 收养的法律适用	(285)
一、收养的法律冲突概述	(285)
二、涉外收养案件的管辖权	(286)
三、收养的法律适用	(286)
四、有关收养的国际条约	(287)
五、我国关于涉外收养的立法和实践	(289)
第六节 监护的法律适用	(290)
一、涉外监护的法律适用	(291)
二、涉外监护案件的管辖权	(291)
三、有关监护的国际条约	(291)
四、我国关于涉外监护的立法和实践	(292)